

春光关不住

——全国中青年图书馆学情报学新思想新观点新方法研讨会讨论随感

宓浩

一、理论价值观

只要稍稍留神一下,就不难发现进入八十年代后我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兴旺势头:感性经验迅速让位于理性思考与本质揭示;传统观念在反思中急剧地被冲刷、更新;系统思想的引入拓展了人们的宏观视野和使用与社会环境联系的全方位考察方法;他学科原理和方法的移植一下子使图书馆学的分支内容显得丰富饱满起来。图书馆学的理论形象变得似乎高大了。

一大批中青年人在这场理论的碰撞反射的变革中,才思敏捷,目光锐利。他们摆脱了传统束缚,提出了震撼人心的学说,并且迅速地站到了学科的前沿阵地。更为可贵的是,他们不沉溺于已有的、或许在有些人看来多少可以沾沾自乐一阵子的理论成果,继续不停地求索、探寻。面对图书馆实践界对理论的某种淡漠或无动于衷,以及图书馆实际活动中的不尽合意、落伍现实的景象,深悟到建设事业,推动实践发展是理论工作的生命所在,理论思维与实践发展必须同步并联。昨天的探索轨迹固然带来了某种理论上的“繁荣”,在眩目的“胜利”光晕下,需要的是再沉思反省:若未来继续循先前的思维定势导向,而不作某种必要的修正或必需的扬弃的话,理论的发展是否隐含着“自我窒息”的可能?

理论价值观被重新提出来作了审视。“降低研究层次”、“淡化学科意识”,走出为

纯粹提高学科地位、追求体系的自我完成,追求高大玄奥的理论架势的要求被中青年图书馆学理论工作者意识到了并提交到会议上作了探讨。

“创新图书馆学,建设图书馆事业”——这次研讨会的宗旨——得到了充分的阐明。站到1987年的高度,进行新的思考,发现新的问题,开始新的探索,落实在事业发展战略和图书馆的重大实践活动上。这就是“创新”和“建设”的本意。对于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目的是否必须明确,它应该面向社会主义建设,面向经济、科学、教育、文化的发展需要,解决图书馆实践中的重大问题,为事业发展,为改观图书馆活动面貌作好理论论证,探寻最佳模式。把科学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作为衡量理论的价值标准。不要一味地喜爱标新立异,随意地创建图书馆××学之类缺乏现实感的空学问;也不要进行大大超前于时代的未来研究。理论界应以强烈的责任感和现实感去开创建设式图书馆学的研究。

这样的认识是必需的、必然的;这样的认识绝不意味着否定八十年代前期所取得的伟大理论成果,也不是重蹈实用研究——理性研究——实用研究的“怪圈”。如果说,理论的功能在于既能科学地解释对象的客观运动,又能指导实践的前进,预测今后的发展,那么,今天,我们所要强调的是在解释客观现象——实事求是地、科学地解释——的同时,力求完成其指导实践的功能。当然,也不忽视预测今后的发展趋势,否则,我

们将感染上近视症。

然而,我们也得承认,理论尤其是它的基础研究不是急功近利、立竿见影于实践上的。当前,思想“逆反”的结果,说不定会导致对基础研究的“狠命一击”,而使它已有的光彩顿然黯淡下来,我们应当防止这类现象的出现。

二、一个基本命题

范并思同学对《新时期十年的图书馆学——观念与思潮》作了系统的回顾总结,堪称为传诵一时的力作。其他类似的十年回顾的文章也纷纷问世,这对于了解、透视这最富魅力的十年图书馆学建树,无疑是大有裨益的。这次中青年理论研讨会把它作为征文的一个内容又赢得了不少有志者的来稿。逝去的十年留下了许多同志高度亢奋、匆匆疾行、慨然命笔的研究成果,其信息量的丰富和洞察力的深刻远远超过了以往的历史年代。虽然,仁、智者各有所见,但全面地总结十年,却是时代的需要。

仔细观察十年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领域,虽然是繁花彩景、纷呈百出,却仍然是围绕着一个基本命题旋转:回答我们的前辈,图书馆学理论大家刘国钧先生早年提出的,“什么是图书馆学?”只不过探寻的路子跨跃了一步,从图书馆内部或其组成要素,从图书的收集、加工、整理、服务等实际工作环节,从藏用关系等事例的直观描述或总结中,企求找出对图书馆学本质的回答,过渡到把图书馆放在整个社会系统和人类交流活动中加以考察,力图挖掘图书馆活动的更深层次的内在本质和内部规律,从中构建学科的理论大厦。这一步的跨跃可说是十年基础理论研究的精髓,它拓展了人们的视野,活跃了研究者的思路,生成了新的理论形象。

历史的功绩既不容忽视,更不能抹煞。

研究视角的大转移给理论带来勃勃生机

的同时,一股暗流也有所抬头。某些研究者自觉或不自觉地把图书馆的外部空间放大拔高了,站得过远、立得过高,以致于模糊了图书馆的本来形象,使研究变得虚无缥缈,玄而又玄;不加点检地引进了几乎包括所有其他主要新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近似于生搬硬套,矫揉造作;任意地“创造”分支学科,洋洋洒洒地对这种分支学科作对象、性质、意义、体系、研究内容等自我完成式的论述,而丝毫不涉及图书馆活动的实际问题。

这种倾向受到了与会的中青年理论工作者的注意,但也不必大惊小怪。如果能说得上忠告的话,切莫一头钻入于此而“白了少年头”,荒废了可贵的研究年华,到头来懊丧不已。当然,对学术理论研究,尤其是新学科分支的出现,要持博采态度,要善于吸取其合理内核,而不是“皱起眉头,紧紧嘴巴”,一概排斥。对于站得过高的同志,希望“下凡”人间,明瞭理论只有在实践中才能生根。

三、两种答案

对“什么是图书馆学”的回答,迄今为止似乎徘徊在两种答案之间。一曰:图书馆学是关于图书馆的科学;另一曰:图书馆学不是关于图书馆的科学,应该寻找一种替代,或上属母学科,或其它名称。主张替代的同志的用心是很良苦的,在于为图书馆学找到一种出路,以便挽回在他们心目中图书馆学理论呈现的颓势。我们无意责难这种见解,因为学术讨论需要民主,要求充分的百家争鸣,各种学术观点、各个学派理应发展,阐明自己的主张,拿出自己的理论体系,最终赢得众人欢心与信服,成为科学的规范。

亮亮自己的观点是必要的,这次中青年理论研讨会不都是观点鲜明吗!在替代的学说尚不能有充分的说服力前,始终不渝地坚持“图书馆学就是关于图书馆的科学”是我的信念。我国图书馆事业正欣欣向荣地发展

着,图书馆活动正日益受着社会的关注和理解。虽然它有不尽如人意,实践内容显得贫乏或者说层次过低,它的理论也太不显眼等众所周知的“陋劣”,难道就应该在我们这一代去埋葬它、或者高唱挽歌吗!也许我曲解了寻找理论替代同志的原意,然而,客观效果不正是如此吗!图书馆学现在“不时兴”了不是在冲撞着一部分同志的心灵吗?!

我们的使命是建设图书馆学、发展图书馆学,创新图书馆学。只要图书馆存在一天,只要社会需要图书馆的服务,我们就要有为发展图书馆事业、提高图书馆的社会效益,用毕生精力穷究其理论的意志和毅力,在下一个十年中更好地促进图书馆学理论的飞跃,并在解决图书馆发展的宏观现实问题及其他重大实践问题上有新的突破。

十年回顾、十年总结,我们要高唱赞歌;其中间或有的偏差,纯属枝节。然而,作为一个呐喊者,一个鼓手的我,或许也要作些“忏悔”,因为本该意识到、本该做得更好些,却没能做好,也未能认识到。还得归功于中青年同志,是他们看到了,并身体力行地去实践了。

四、新时期需要的 图书馆学家形象

“新的十年在急切呼唤理论大家”。这次会议中已经有青年同志在塑造这样的理论家形象:这种理论家应具有丰富的实践素质,精通本行的业务和管理才能;倒转来,实干

家要具有较高的理论修养和宏观意识,善于从实践中提炼、升华理论。这种结合是我们塑造未来图书馆学家的应循途径。

缺乏扎实的实践素质和丰富的感性经验,也许是造成今天理论上“跛足”的缘由,并派生出某种“清谈”之风。调整理论与实践的分离,已被提到了议事日程,我们应该为之努力,为之创造条件。

西方的谢拉、兰卡斯特、布鲁克斯、加菲尔德,苏联的米哈考诺夫、丘巴梁,印度的沉冈纳赞等,既是高明的图书馆学、情报学家,又是在许多图书情报业务领域中具有极高造诣的专门家。我国近代图书馆学的奠基人沈祖荣、杜定友、刘国钧等老一辈,不也都是身具理论和实践的丰富素养,驰骋于图书馆疆场吗!新时期的图书馆学家应以他们为表率。

全国中青年图书馆学情报学新思想新观点新方法研讨会匆匆逝去了,会议收到大约350篇论文,选录了55篇参加大会交流。我作为会议的参与者和“幕后策划者”,阅读了几乎全部的论文,和中青年同志切磋学术、交流心得,所受到的教益非笔墨所能着意渲染。他们的朝气熏陶了我,他们的韧性战斗精神和锐利的观察能力对我是一种巨大的召唤。眼看我国图书馆事业中又一代人才辈出,春光灿烂,它象征着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兴旺繁荣。

向中青年同志学习,平生幸事,莫过于焉,志文祝贺,亦为自勉,并也算作我对逝去十年的缅怀。